

畢 戈 羅

死 魂 灵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果戈理
死 魂 灵

满涛 许庆道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Н. В. ГОГОЛЬ
МЕРТВЫЕ ДУШИ

据 Н.В.ГОГОЛЬ,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5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49) 译出。
插图系根据 ДЕТГИЗ 1953 年插图本复制, 作者
ЛАПТЕВ。作者像作者 МОЛЛЕР。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
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 主持选
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 并由上述两
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完 稿 页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33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 $\frac{1}{4}$ 插页 14

198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83 年 9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500

书号 10019·3507

定价 2.35 元



作者像

译 本 序

一八四二年五月，果戈理的《死魂灵》第一卷问世。小说是作者几经周折，冲破审查机关的重重阻碍，才得以出版的。《死魂灵》的出现，在俄国知识界立刻掀起了一场争论。有的人把它贬得一无是处，有的人又不恰当地把它誉为当代的《伊利昂纪》。别林斯基当时撰文指出：“没有一个诗人遭遇过象果戈理这样古怪的命运；连能够把他的作品背诵如流的人，都不敢把他视为伟大的作家；对于他的才能，没有一个人是漠然视之的；不是狂热地爱他，就是对他怨恨入骨。”^①读者因一部小说而分成壁垒分明的两边——崇拜者和反对者，这在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无怪乎赫尔岑说：“《死魂灵》震动了整个俄国！”

果戈理生前景况并不如意，他因自己的创作一生受尽诽谤，加上生活上的种种烦扰，朋友间的激烈争论和尖锐的对立，常常使他陷入精神忧郁的境地。不过从文学史的观点看，他毕竟是幸运的。可以说他的《死魂灵》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石，小说的艺术创作原则，为后来的俄国作家所公认和发展，它的批判倾向，对于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长足进步，具有方向性的意义。

^① 《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第41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一八三五年秋，果戈理开始创作《死魂灵》。在这之前，他已出版了《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其中包括《涅瓦大街》、《肖像》和《狂人日记》）。他在这些作品中显露出来的幽默和讽刺的艺术才能，深为普希金所赞赏。为了支持果戈理的创作，普希金把自己搜集得来的有关《死魂灵》的素材，无私地送给了他。不久之后，果戈理写信给普希金说：“我已动手写《死魂灵》，这将是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而且它也许会使人发笑。但是我现在写到第三章就搁笔了……我打算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即使只从一个侧面也好，一定要把整个俄罗斯反映出来。”^①为什么果戈理写到第三章就停笔下来呢？原来这时他产生了写作喜剧的强烈愿望，于是他又向普希金求助，从后者得到了《钦差大臣》的素材。次年，在《钦差大臣》上演后不久，果戈理准备旅居国外，继续《死魂灵》的创作。行前他把已经写好的几章初稿念给普希金听，诗人听过后感怀忧郁地说：“老天爷，我们的俄罗斯是多么令人忧伤啊！”^②《死魂灵》是果戈理在异乡漂泊的年月里，怀着无穷的乡愁写成的。

在《死魂灵》里，果戈理谈到有两种作家。一种作家回避现实，隐瞒生活真相，只写虚幻和美丽的故事、高尚的人物，为此他会大受世人欢迎。另一种作家则面向人生的坎坷、世道的艰辛，他的琴弦决不奏出甜美的歌，却只是深入那冷酷的、破碎的和平凡的性格深处，用不倦的雕刀来刻划出真实的人物形象，透过那“世人所能听得见的笑和世人见不到的、没有尝味过的泪”，来再现人生。果戈理生在黑暗时代，满目时艰，他无疑同意并且属于后一类作家。他的创作展现了俄国社会的停滞和历史发展必然

① 《果戈理全集》，第10卷，第375页，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40年。

② 《果戈理全集》，第8卷，第294页，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2年。

要求之间的矛盾；普通人的不幸命运和他们对自由、幸福的向往。

《死魂灵》描写唯利是图的乞乞科夫来到某市，交结了省长、税务厅长、警察厅长等官僚，然后向该地地主收买已经死去而尚未注销户口的农奴——死魂灵，企图把他们当作活的农奴，抵押给监督委员会，骗取大笔押金，在丑事即将败露之际逃之夭夭。果戈理通过乞乞科夫同一批贪官污吏和各类地主的交往，广泛地展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把这些自称为“生活的主人”的丑类的庸俗、愚昧、贪婪、腐朽以及资本原始积累者的那种不择手段、冷酷无情的欺诈行径，尽情地加以嘲笑，使地主贵族的卑琐志趣、动物式的贪欲、精神的空虚、道德的堕落情状暴露无遗。小说还揭露了沙皇政权反人民的实质，透露了农奴制衰亡、没落的消息，写出了俄国文学前所未闻的震慑人心的东西。在俄国十九世纪的一些训诫小说里，地主们显得温文尔雅，无一不是正派人物。《死魂灵》一反这类小说，使“生活的主人”现出原形。正如赫尔岑所说的：“果戈理终于迫使他们走出别墅，跑出地主的家院，于是他们就不带假面具、毫无掩饰地在我们面前走过，他们是醉鬼和饕餮之徒，他们是权力的谄媚的奴隶，是毫无怜恤地虐待奴隶的暴君；他们吞食人民的生命和鲜血，竟是这样自然、平静，有如婴儿吮吸母亲的乳汁一般。”^①这种撕下统治阶级假面具的无情揭露，正是果戈理作品的新内容，带入俄国文学的新东西。但是这使保守势力深为惶恐，以至要诬蔑《死魂灵》把一切优良的东西“淹没在胡闹、恶俗和废话的大杂烩里面”。他们指责小说展现生活的“污秽”，充满“无聊”琐事，“没有

① 《赫尔岑论文学》，第7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

内容”，只写浑身缺陷、志趣低下的人，却不写正人君子，而且用语“粗俗”，书中官僚、地主的话，就连一个“正派的”仆人也说出口。因此小说在“矜持拘礼的客厅里，在艳装小姐的闺房里”，那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等等。在这类指责里，贵族老爷的情绪可说溢于言表。对此，果戈理在关于《死魂灵》的第三封信里写道：“……使他们害怕的是，我的人物一个比一个庸俗，没有任何现象可以使他们感到慰藉……如果我写出了不同寻常的恶棍，人们很快会原谅我，但是决不能宽恕我表现了庸俗。”①别林斯基对《死魂灵》的出现感到由衷的喜悦，他驳斥了反动文人对小说的攻击，指出果戈理是勇敢而直率地注视俄国现实的第一人。“《死魂灵》这部作品所以伟大，正因为它在里面揭露并解剖生活到了琐屑之处，并且赋予这些琐屑之处以普遍意义。”②

在《死魂灵》里，俄国社会生活的阴暗面，通过卑琐的统治阶级人物群像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些人物性格后来被称为文学典型。

玛尼洛夫浅薄无聊，耽于幻想。这种人外表显得斯文知礼，善于应酬，但是你马上就会发现，他不具鲜明个性，言谈极端贫乏，而缺乏明确的个性，又正是这类人的个性特征。那张两年前就夹在一本书的第十四页的书签，无情地暴露了他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上的慵懒。女地主柯罗博奇卡则是固执、愚蠢，与世隔绝而又略带几分机警的人。她精心经营家业，铢积寸累，竭力支撑着旧式的小小庄园。如果说玛尼洛夫的庄园是宗法制农村走向凋敝的预兆，那么她的庄园则是那种自给自足的宗法式农村的缩影，不过象这种地方，在当时的俄国已为数不多了。

① 《果戈理全集》，第8卷，第294—295页，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2年。

② 《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第50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诺兹德廖夫嗜酒好赌，撒谎成性，横蛮霸道，无所不为，表现出了乡间恶少、地痞的本色。果戈理用熊的笨拙的特征来描绘地主索巴凯维奇的外貌，而索巴凯维奇的心理，也无不象熊一样贪婪和冷酷。他精明务实，狡诈异常，行诈而不受人骗。敛财与饕餮是这个高利贷者的本质特征。在普柳什金身上，果戈理主要突出了他的吝啬。他拥有上千农奴，但却衣衫褴褛，形同乞丐；他贪财如命，不惜与子女断绝来往；他宁可让粮食霉烂变质，也不让农奴得到温饱，致使大批农奴外逃谋生，或如蝇子般死亡。守财奴的本性使他大量破坏物质财富，丧失一切人性感情。他的残破不堪的庄园，是宗法制农村走向解体过程的生动写照。

乞乞科夫是小说里的中心人物，小说通过他收买死魂灵的经历，把俄国城乡一幅幅的生活画面联接了起来，再汇集成一幅危机四伏的俄国社会的完整的图画。此人精明强干，老谋深算，善于审时度势，适应任何环境，为了达到发财致富的目的，不惜践踏任何道德原则。乞乞科夫这种“好掌柜”式的生意人，是十九世纪初俄国社会中的新现象，是农奴制行将没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的产物。由于是新现象，所以在小说第一卷的最后一章里，补叙了这个人物的成长。乞乞科夫出身小贵族，自小接受的家庭教育是：一要想方设法博取上级的欢心；二是“有了钱什么事你都能够办得到，什么路你都能够打得通”。这种“家训”后来成为乞乞科夫的处世哲学。他走进社会后，奉迎上司，贪污受贿，大搞投机事业，当丑行被揭露、遭到打击时，又善于从逆境中脱身，伺机再起。收买死魂灵是他屡遭挫折之后的又一攫取钱财的新“事业”，表现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正在成长中的资产者的掠夺本性。

《死魂灵》的另一方面的主要内容，在于揭示了人民的痛苦的处境，他们合理的生活追求。广大人民生活的悲惨境遇，常常通过“生活的主人”丑行的描写，间接地表现出来。在乞乞科夫和玛尼洛夫交谈死魂灵的买卖时，后者说他的农奴“死了很多”，但到底有多少，他却说不清楚。在索巴凯维奇那里，死去的农奴中不少是结实的庄稼汉，会修房造车的能工巧匠。小说通过市里官僚谈论农奴移居问题，从侧面告诉读者：广大农奴由于不堪忍受压迫，或结伙逃亡，或聚众暴动，杀死为非作歹的宪兵，等等。特别写得出色的是，在乞乞科夫的勾当即将败露之时，小说插进了一个戈贝金大尉的故事。戈贝金在反抗法国入侵的卫国战争中成为残废，生活无着，去彼得堡也是求告无门，在屡遭冷遇和侮辱并被押送回乡之后，终于忍无可忍，铤而走险，占山为王去了。故事谴责了反动官僚的假爱国主义和表现了官逼民反的必然趋势。

《死魂灵》揭露出来的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它的批判倾向，曾使当时俄国的有识之士深为震惊，意识到不改变现状，就无法拯救俄国。小说的客观效果甚至使作家本人也大为惊恐，好象出乎他的意料，以致在受到保守势力的影响后，竟在小说的二版序言（一八四六年）中说：“在这本书里，许多描写是不正确的，不真实的，与俄国发生的情况不符。”^①不过俄国的进步舆论是公正的，别林斯基认为果戈理是一位“合乎时代精神的诗人”，指出《死魂灵》的出现表明了俄国文学正在“不断地走向独创性和民族性”，在这方面，“没有一个作家获得象果戈理一样大的成功”。^②

① 《果戈理全集》，第6卷，第587页，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1年。

② 《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第400页，时代出版社，1953年。

《死魂灵》在艺术上别具一格，它的人物性格描写，幽默与讽刺的运用以及和抒情的结合，都无不显示出它特有的独创性，在俄国文学中独树一帜。

小说在塑造人物的性格方面，大致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作家通过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活动，以肖像画的方法鲜明地勾勒出他们的性格特征，精神面貌，而不展现其形成过程。玛尼洛夫等几个地主形象的刻划，就属于这一类型。一是作家在描写人物性格时，也写他的形成过程，对于乞乞科夫的刻划就是如此。但无论使用哪种方式，果戈理都十分注意环境在人物性格形成中的支配作用，而不仅是把环境看作人物活动的场所。别林斯基在谈到《死魂灵》中的人物时说：“这些人物所以为人丑恶，是在他们所受的教养上，在粗鄙无学上，却不是在本性上……”^①小说中地主们的各种性格特征，无不与农奴制，地主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和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文化教养有关。其次，果戈理在人物描写中十分自觉地强调人物性格中的个性特征，他抓住这些特征之后，加以充分的夸张与集中，把它们推向极限而又不失其真。小说中各个地主的形象的特征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作为性格特征，果戈理实际上只突出了他们每个人的某些方面。有时重复描写它们，目的在于使其发展为人物性格中的充分个性化的东西，使人物成为富有个性特征的“这一个”。果戈理塑造的人物典型，有的已成为文学中的“普通名称”或“共名”，例如人们遇到吝啬的人，就会联想到普柳什金其人。一个艺术形象能够如此深入人心，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极高的

① 《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第45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荣誉。

果戈理在揭露俄国社会和鞭笞“生活的主人”时所显示出来的强烈批判倾向，同他使用的幽默讽刺手段也是分不开的。一般人固然都可能在生活中发现某种可笑的现象，但是事事处处能抓住笑的契机，却是少有的才赋。果戈理自己说过，人们对发了不少议论，但都未能判明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只有普希金一人觉察到了。诗人对果戈理说：“还从来没有一位作家有过这样的才华，善于把生活中的庸俗那样鲜明地描绘出来，把庸夫俗子的庸俗，那么有力地勾勒出来，使得所有容易被滑过的琐事，一览无余地呈现在大家眼前。”^①这就是果戈理的主要特征。《死魂灵》最终地形成了果戈理的富有独创精神的创作个性，在这里，庸俗人的庸俗主要通过幽默的笔调和讽刺的描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这决不是向壁虚构，作家只是敏锐地抓住生活中可笑的现象，把它们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而已。这也决不是为了博得浅薄的一笑，而是在让人笑过之后，继之以沉思，一种沉郁的思索。果戈理的幽默讽刺，溶入了人物的外貌、动作、言语、心理和场景描写之中。即便是一件家具，人物的一个动作，转眼之间，作家可以赋予它们以特殊的意义，成为讽刺人物的手段，造成幽默滑稽的情势。索巴凯维奇熊一般的长相和动作，普柳什金衣衫破烂、不男不女的打扮，玛尼洛夫和乞乞科夫进入客厅时长时间的谦让的滑稽镜头，诺兹德廖夫杂乱而缺乏逻辑的语言，乞乞科夫和柯罗博奇卡、索巴凯维奇谈判买卖时的不同心理反应，都是显示人物性格的出色的讽刺描写。至于官僚衙门，果戈理是极为痛恨的，他把这些衙门描写得宛如一架

^① 《果戈理全集》，第8卷，第292页，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2年，重点是原有的。

无情的机器，用嘲讽的笔触，把那里贪污受贿的普遍的腐败习气，生动地展现于读者之前。这是一种能够激发起读者鄙视和愤怒的讽刺。不过，如果我们顺着故事的讽刺笔触而潜入作者的内心，则不难发现他是怀着极大的痛苦写成《死魂灵》的。例如，其中涉及死魂灵买卖的场面，虽则喜剧性十足，但一切又带有悲剧色彩，以滑稽的喜剧形式演出悲剧，就更显出作家内心忧愤之深广。因此我们可以说，《死魂灵》中的讽刺和由此而引起的笑，正是作家愤慨的表现。

《死魂灵》作为讽刺作品，又运用了抒情插叙，这是俄国文学中罕有的现象。果戈理看到，现实生活里没有一线光明，处处是普柳什金家院式的败落景象。因此，他描绘生活本来面目，不作半点粉饰。但是，果戈理作品中的否定精神和理想是互为依存的。“崇高和美常常是从卑下的、受人鄙视的生活里冒出来的，或是由于无穷的和不同性质的现象的撞击而引起，这些现象使人类生活不断地变得五彩缤纷……”^①在《死魂灵》里，果戈理一写到人民的命运时，他原来那支充满嘲讽意味的笔，立刻会倾泻出抒情的音调；他描绘了理想的祖国，有如疾驶着的三驾马车，飞奔向前，唱出广漠无垠的大地一定会诞生英雄的歌。但是在当时真正的死魂灵仍然统治俄国，人民无穷的才智受尽摧残。所以作家难以用艺术描写把理想具体化，他运用了抒情插笔的形式，来表达他对理想的向往，对人民的赞美，对祖国命运的忧思。在这种场合，那洋溢着激情的、高远而嘹亮的音调，真如穿透乌云的太阳光束，照射到现实深处，使生活愈加显出其丑陋，从而更加反映出小说对现实的否定倾向。也正是这种昂扬的抒情笔

① 转引自艾里斯别格：《讽刺理论问题》，第91页，苏联作家出版社，1957年。

调，赋予《死魂灵》第一卷以激动人心的力量。在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抒情和幽默、讽刺的奇妙结合，大概只有在《死魂灵》中才能见到。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在有的抒情插笔中，也夹杂着某种神秘因素，如小说十一章里写到：“会有一个天赋神明般德性的大丈夫上场……”云云，这是宗教神秘思想的流露，别林斯基当时就曾为此不安，这种因素后来真的发生了消极影响。

果戈理善于从荒诞不经的事件中摄取题材，能够在那些初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物中，发现其合理因素，通过艺术加工，把事物的偶然性，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艺术的必然性。并且既保持原来事物的荒诞性，又赋予它以深刻的社会意义。《钦差大臣》是如此，《死魂灵》也具有这种特点。例如作家抓住了买卖死魂灵这类带有耸人听闻的特点的事件，通过艺术提炼，使其转化成为含义深刻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在情节选择方面，果戈理极好使用突然和意外的因素，造成结构上的波澜起伏的紧张性。小说中五个地主的出场颇具匠心，写法各不一样。乞乞科夫先是结识了玛尼洛夫、索巴凯维奇和诺兹德廖夫。他去拜访玛尼洛夫，受到一番礼遇，而在去索巴凯维奇家时，深夜迷路，意外地闯进了柯罗博奇卡的庄园。同这个女地主的买卖谈判使他大费口舌。而在路上的小酒店里，竟与诺兹德廖夫不期而遇。乞乞科夫原来以为从他那里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一批死魂灵，谁料事与愿违，竟受到种种侮辱。之后，他又煞费心力，与索巴凯维奇进行了一场钩心斗角的买卖。随之引出普柳什金，乞乞科夫出乎意外地从他那里便宜地买到了一批死魂灵。乞乞科夫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又来了一个突然。作者让诺兹德廖夫与柯罗博奇卡在乞乞科夫的买卖中发生意料不到的影响：一个不请自至，

以其习以为常的造谣方式，当众揭穿乞乞科夫“在做死魂灵的买卖”；一个则不顾远道，进城来打听死魂灵的时价，估量自己在卖价上是否吃亏。结果谣言夹杂真情，四处传播，官僚们议论纷纷，摸不透乞乞科夫为何物，于是气氛骤变。乞乞科夫四处碰壁，惊惶失措，只得溜走了事。可以看到，情节布局中这种峰回路转的描写，十分引人入胜。

《死魂灵》问世后不久，果戈理于一八四三年初出版了自己作品的四卷集，其中收有过去未曾发表过的作品，如《外套》等。就这些作品的思想倾向来说，它们和《死魂灵》第一卷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自此以后，果戈理在思想上、进而在创作上发生了深刻的危机。

四十年代，随着俄国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社会思想斗争有所加剧。围绕俄国向何处去，社会如何才能振兴等问题，保守的斯拉夫派，自由主义的西欧派和革命民主派之间的争论日趋激烈，彼此间的对立也日渐分明。这时果戈理却站到了保守阵营一边。他害怕社会震动，不赞成通过革命途径解决社会问题，他转向宗教、道德的探求，以为个人的内心的修养和自我完善，乃是平息现实中“普遍纷争”和改造社会的有效手段。这种错误思想在他一八四七年出版的《与友人书简选》中，发展到了顶点。他竟认为农奴制是最理想的制度，农奴应该安分守己，听凭农奴主剥削和奴役。他的这种反动思想，受到了别林斯基的严厉批判。

《死魂灵》第二卷的写作，早在一八四〇年就已开始，现行流传的《死魂灵》第二卷是未完成的残稿，因此缺乏结构上的完整性。据苏联学者的考证，这五章残稿写于一八四三——一八四

五年间^①，是作家思想危机开始时期的产物。所以一方面，它在思想艺术上与第一卷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第二卷的批判锋芒大大减弱了，作家在一些章节中，企图从没落阶级的人物中间寻找力挽狂澜、振兴农奴制的理想人物。这两个方面，在小说的不同人物身上分别反映了出来。

乞乞科夫仍然干着收买死魂灵的勾当，不过这已不是小说发展的主要线索。他依旧圆滑世故，善于随机应变和揣摩对方心理。但终以诈骗他人巨额遗产的丑行败露，再次锒铛入狱。在绝望的时候，他向人求饶，声言一定悔过自新；一旦处境稍有好转，却又立刻故态复萌。

坚捷特尼科夫的形象，使我们想起了玛尼洛夫。他原来胸怀大志，但由于腐朽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使他一无所长。在仕途受挫之后，就隐居乡间。他对农事一窍不通，整日在“构思”一部关于俄国的鸿篇巨著，借此消磨时光。地主彼杜赫是一个索巴凯维奇式的人物，不过没有那么狡狴，但也是一个饕餮鬼，整天只知安排吃喝。对于退伍上校柯什卡廖夫，小说着墨无多，但刻划得十分生动。柯什卡廖夫管理田庄的办法是文牍主义的。在他的田庄办事，必须先写申请，逐级传递，再由他亲自审批。他还盲目崇外，声称“只要给半数俄国庄稼汉穿上德国款式的裤子，科学就会昌盛，商业就会繁荣，黄金时代也必将来临于俄罗斯”。至于破落地主赫罗布耶夫，在经济上虽然已经山穷水尽，却仍不肯放下贵族架子，一有进款，立即挥霍干净，连乞乞科夫也把他视为“浪荡子”。由于这些人物都是俄国社会的消极现象，所以果戈理对他们仍然抱了一种嘲讽的态度，在描写他们时，“笔力

^① 见赫拉普钦柯：《果戈理的创作》，第488页，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4年。

不让第一卷”^①。但我们又分明看到，果戈理在这里同时使用下述原则，“我的人物决非坏人，只要我给其中任何一人加上些正面特点，读者就会同他们握手言欢。”^②例如对贝特里歇夫将军的描写，说他“既有关键时刻的大度，勇猛，无比慷慨，处事机敏，却又掺杂着任性，虚荣，自爱……”对赫罗布耶夫也是如此。总之，在倾向性上是不同于第一卷的。

我们在前面说到，《死魂灵》第一卷出版后，有人指责果戈理只写满身恶行的人，而不写高尚人物。果戈理在《死魂灵》二版序言中谈到，“优秀的人物和性格将在后几卷里出现。”第二卷中的柯斯坦若格洛和摩拉佐夫，就是作家的理想人物。柯斯坦若格洛被作家写成振兴农奴制的“优秀的人物”，他精力旺盛，管理有方，认为地主“必须对劳动怀有热爱”，声言“我自个儿干活也象牛一样拼命地干，庄稼汉在我这儿也得这样”。为了解决自己的农产品的出路，他利用大批快要饿死而投奔他的农奴，开办各种工厂，大发其财，而且据说他庄里的庄稼汉，也“过着金银铺满地，铲子铲不尽的好日子”！小说写到专卖人、豪富摩拉佐夫时，说他“不但可以管理地主的庄园，简直可以管理一个国家”。此人笃信宗教，道德高尚，虽有千万资财，但穿着简朴。他以“对善的爱”和“强迫自己行善”来启发乞乞科夫灵魂的自新。毫无疑问，果戈理企图通过这两个人物，描绘出一幅美妙的社会图景：“普遍纷争”将为普遍和谐所代替，地主和农民将共同富裕。由于这纯粹是一种幻想，既无现实基础，也歪曲生活，所以这些人物身上充满了说教气味，艺术上也苍白无力。至于结尾一章中的公爵，一面好象深知社会积弊，一面又要求各级官僚克尽职守，和

① 《鲁迅论文学与艺术》，下册，第9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② 《果戈理全集》，第8卷，第293页，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2年。